

慧眼识珍——高岛菊次郎藏中国书画研究

Discerning Treasures: A Stud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Kikujirō Takashima

邱吉 QIU Ji

摘要 高岛菊次郎是近代日本著名的实业家、书法家和篆刻家，平生热衷于收藏中国书画，他的收藏不仅数量大、品种多而且质量高，以“槐安居”收藏著称。本文以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高岛藏品”为中心，较为系统地梳理和考察了高岛购入这些书画的主要时间、地点、价格、旧藏者等具体的细节和经过，试图通过探究高岛购藏中国书画的动机和原因，管窥近代日本的中国书画鉴赏品味从“煎茶趣味”转向“新舶载”的收藏和研究动向。

关键词 高岛菊次郎，新舶载，中国书画，槐安居藏品，东京国立博物馆

Abstract: Kikujirō Takashima is a renowned industrialist, calligrapher, and seal engraver in modern Japan, who had a passionate interest in collecting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His collection, known for its large quantity, diverse types, and high quality, is famously associated with the “Kai-an Resid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akashima Collection” at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systematically organizing and examining the specific details and processes of Takashima’s acquisitions, including the main timing, locations, prices, and previous owners of these artworks. By exploring Takashima’s motives and reasons for collecting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the study aims to glimpse the shift in modern Japanese taste in appreciating Chinese

本文为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20世纪以来中国书画文献在东亚的译介传播研究”（23CF19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邱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艺术文献学、中国书画鉴赏史。



图1. 东京国立博物馆（笔者摄影）



图2. 高岛的收藏笔记11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from the “sencha interest” to a trend of collecting “newly arrived foreign goods.”

Keywords: Kikujirō Takashima, newly arrived foreign goods,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Kai-an Residence Collection, Tokyo National Museum

东京国立博物馆于1872年开馆，是日本最早的国立博物馆（图1），同时也是日本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它所设东洋馆专门陈列中国文物。东洋馆的中国书画核心馆藏为“槐安居藏品”，由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社长高岛菊次郎（1875—1969）收藏的345件中国书画组成。关于近代日本的中国碑帖和书画收藏家高岛菊次郎，起初知晓其名号的人并不多，近年来随着“高岛菊次郎氏寄赠中国书画：槐安居收藏”（2007）、“清朝书画收藏的诸相：以高岛槐安收集品为中心”（2021）、“复古与传承：赵孟頫与其时代”（2022）等特展的举办^[1]，高岛的“槐安居”收藏名号逐渐从书画界走向大众。

然而目前由于“槐安居藏品”尚未完全对外公开，加之中日语言上的障碍等因素的影响，至今鲜少有人关注和研究高岛菊次郎的中国文物收藏活动，仅有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富田淳先生做过基础研究^[2]。据笔者调查，高岛的书画收藏笔记共有11册（图2），分别是《拓本》《宋元人书画卷册》《明朝名家》《明人书画卷册》《清朝名家一》《清朝名家二》《清朝名家三》《清朝人书画卷册一》《清朝人书画卷册二》《本朝南画诗书》《明治以后书画》。这些笔记均为高岛亲自书写，其全貌尚未影印出版，主要是他对书画的作品名、作者简介、释文、时代、材质等内容的记载，有趣的是里面还有不少他即兴临摹的书画作品。此外，这些笔记还记载了高岛对入藏书画的编号、来源、价格等信息的红色批注，是考察高岛收藏中国文物活动的重要资料。

[1] 黄政霖、张亚敬：《“复古与传承：赵孟頫与其时代”观展札记》，《美术观察》2022年第4期，第35—36页。

[2] 富田淳：《槐安居コレクションと聴氷閣コレクション》，关西中国书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编《关西中国书画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来》，黒川古文化研究所，2012，第73—81页。

一、高岛菊次郎及其“槐安居”收藏

高岛菊次郎，号槐安，斋号槐安居、三柳居，福冈县人。1900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现一桥大学）并入职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先后前往大阪商船的香港和台湾淡水分公司工作。1902年入职三井物产，随后被派往香港、厦门、福州、台北、大连等地。1912年进入王子制纸株式会社，随后在东京麹町建立住宅“槐安居”，后来历任王子制纸董事、常务董事、专务董事、社长^[3]。高岛不仅在中国有丰富的阅历，还精通汉文和英语。明治维新之后，由于受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政策的影响，日本的工商业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日本的西化政策，促使其仿照欧美的现代收藏制度，建立了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进而也催生了一批艺术收藏家。这些藏家往往是经济雄厚的实业家、商人、学者，他们大多拥有极高的汉学修养并热衷于收藏中国文物，高岛就是其中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

“槐安居藏品”网罗了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书法、绘画、碑帖、法书等，种类丰富。书法有宋代朱熹、高宗、蔡襄等，元代赵子昂、鲜于枢等，明代王守仁、陈献章、祝允明、董其昌、倪元璐、傅山、王铎等，清代查士标、毛奇龄、金农、张照、邓完白、何绍基、康有为等代表作家。绘画有元代王蒙，明代沈周、文徵明、徐渭、董其昌等，清代王时敏、王鉴、吴历、王石谷、恽寿平、高凤翰、新罗山人、石涛、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等代表作家。碑帖和法书有《独孤本定武兰亭序并兰亭十三跋》（图3）、智永《千字文》、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等名作^[4]。

高岛醉心于收藏中国的金石书画，跟他丰富的中国履历和雄厚的经济资本密切相关。此外，他与犬养毅、山本梯二郎、大仓喜八郎、马越恭平、村山龙平等政经界人士交好。以上人物都是地位显赫的名流，他们时常切磋书画技艺并喜爱购藏中国文物，在此种文人文化热潮和收集中国文物氛围的熏陶下，高岛通过书画家、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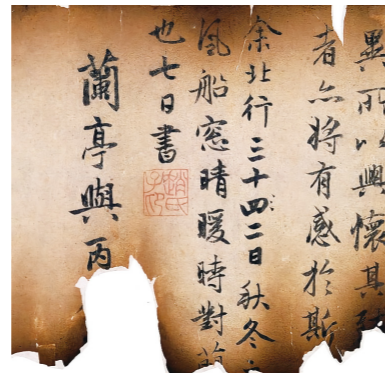


图3. [元]赵孟頫，《独孤本定武兰亭序并兰亭十三跋》（局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3] 河野幸之助：《高岛菊次郎传》，日本时报社出版局，1962。

[4] 东京国立博物馆编《高岛菊次郎氏寄赠中国美术展》，东京国立博物馆，1965，第1—72页。

藏家、古董美术商等各种人脉逐步建立起了高水准的中国书画收藏。1965年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即将开馆之际，高岛菊次郎捐赠了277件中国书画和碑拓法帖。高岛去世之后，其家人又向东博捐赠了68件中国书画。1965年3月30日，日本《每日新闻》对高岛的书画捐赠仪式进行了报道：

这个5月即将迎来90岁的日本制纸业大前辈、前王子制纸社长高岛菊次郎翁，将耗时40年收集的贵重中国书画大约300件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本月30日在神奈川县藤泽市鹤沼的高岛府邸举行了捐赠仪式，未曾公开的“高岛收藏”时价约1亿日元。作为民间寄赠的美术品，与战前的“横河民辅收藏”以及战后的“松永安左卫门收藏”齐名。^[5]（笔者译）

高岛毕其半生都酷爱收藏中国书画，其数量和质量均为上乘。关于藏品的捐赠契机，高岛曾在采访中谦逊地说道：“虽说是一些粗犷的东西，但是多少还有些价值，聊以自娱已久。即使留给子孙，若是没有兴趣也是无可奈何。如果就这么放着的话，某一天也会散佚的，因此还是决定捐赠给博物馆。”^[6]（笔者译）据《每日新闻》报道，高岛的中国书画收藏始于1922年^[7]。笔者对高岛书画收藏笔记中记载有购入经过和记年的条目进行了部分不完全统计，其购入时间和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有购入记年作品统计

购入年	西历	总数
明治44年以前	1911	2
大正元年至大正11年	1912—1922	7
昭和7年	1932	1
昭和8年	1933	2
昭和10年	1935	7
昭和11年	1936	30
昭和12年	1937	23
昭和14年	1939	1

[5] 《每日新闻》（夕刊）1965年3月30日，第4版。

[6] 同上。

[7] 同上。

高岛最早在1912年以前就开始了中国书画收藏。购入的2件作品分别是戴明说《悬崖墨竹图轴》（编号343，纸本。此余大连在任中所获，自原田氏北京将来品中也，值80金）和张瑞图《草书五言律诗轴》（编号455，大连假寓中自原田氏入手，绢本）。从这两幅作品的购入记录可知，高岛的购入地点为大连。1907年，高岛从三井物产台南事务所所长转任总公司砂糖系长，随后又被派往大连的“三泰油房”工作，直至1912年才回国进入王子制纸。据此推测，高岛购入戴明说和张瑞图作品的时间范围应该是在1907至1912年之间。此处“原田氏”，应是美术出版社、古董美术商博文堂的老板原田庄左卫门（1858—1938），庄左卫门是原田家族的世袭名字，原名原田清太郎，号大观，埼玉县人。辛亥革命前后，博文堂除了影印出版美术书籍之外，还兼营中国书画的买卖业务，是当时著名的文物买卖中介，犬养毅、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等人担当博文堂的学术顾问。综上可知，高岛开始收藏中国书画应该是在1912年之前^[8]。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高岛致力于以老子和庄子为中心的汉籍研究，同时专心研习书法和篆刻，在中国思想与艺术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

1945年，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东京大轰炸”，幸运的是高岛所藏的书画在战火中幸免于难。尚在上海的高岛得知此事后，在写给下属加藤藤太郎的信札中说道：“糊叮的书画仓库在空袭中幸免于难，此乃天赐奇迹，吾欲将其转移到安全之地。7月2日我给内人写了书信，嘱咐她与有香堂的守口三郎商量，将书画卷册打包，如果装裱的画轴过重，可以将画轴拆卸去掉，只取其‘坯’如何？”^[9]（笔者译）从此处高岛的信札中可以窥见虽然他远在中国，但是仍然心系收藏书画的安危，这也从侧面显示了高岛收藏书画的数量之巨。信中提到的守口三郎是时常出入高岛东京府邸的古董商人。守口生于大阪，年轻时曾前往北京学习制作中国陶器，后来在东京获洼开设了“有香堂”古董商铺。守口与高岛私交甚笃，他虽善于识别陶瓷器，但是不懂书画，经常前往高岛府邸请教。在守口的帮助之下，高岛的书画成功转移到岐

[8] 《每日新闻》报道高岛的中国书画收藏始于1922年，本文不采纳这一观点，本文认为这是高岛开始规模性收藏的时期。

[9] 槐安居春秋刊行会编《槐安居春秋》，求龙堂，1970，第94页。

阜县实业家矢桥亮吉（1867—1946）府邸中，最终这批书画得以完好地保存至今。

二、“槐安居”收藏来源考

据收藏笔记中高岛菊次郎的书画编号和批注记录，他的“槐安居”收藏大部分是从金颂清（1878—1941）、守口有香堂、井上晚翠轩、原田博文堂等中日古董美术商处购买，亦或者是经过河井荃庐（1871—1945）、小野钟山（1880—1952）等日本文人介绍购入。此外，高岛购藏碑帖、书画的旧藏者还有盛昱（1850—1900）、罗原觉（1891—1965）、罗振玉（1866—1940）、山本梯二郎（1870—1937）、山本竟山（1863—1934）等收藏家。

1. 金颂清旧藏品

金颂清，字兴祥，号雅声，清末书画家金尔珍之子，浙江秀水（今嘉兴）人。金氏少习儒学，1899年补博士弟子员，致力于经史之学，对图书文物的研究有较高造诣，善鉴真伪。他与王国维一同受业于藤田丰八，深晓日文，译书甚多，著有《管蠹小识》。1914年与罗振常在上海创办食旧廛书店，1915年创立青籟阁书店。1926年在上海开设中国书店，1931年又在大连创墨缘堂书店。金氏除了经营古今图书之外，还是在中日之间从事金石书画买卖的古董商，中国书店经销日本书籍画册，同大阪博文堂、东京文求堂有业务往来^[10]。现今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三井纪念美术馆收藏的不少书画精品均是所谓“金氏携来品”或“金颂清氏将来品”。

高岛在批注中明确记载是从金颂清处购藏的书画共有13件，购入年份是在1936至1937年之间（见表2）。关于购入书画的价格，除了《唐濮阳令于孝显碑》（100金）、姚姬传《秋夜七绝草书》（200金）、明钱穀《淡彩山水》（1700日元）三件有标记之外，其余作品价格不明。1936至1937年，金氏多次前往东京的晚翠轩举办古董展览并销售中国书画。晚翠轩是1899年由井上清秀创立的美术出版商行和古董商行，汉文除了影印出版中

[10] 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嘉兴市志》第3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第2086—2087页。

国的法书和碑帖之外，还销售文房四宝、金石书画以及为赴日的中国收藏家提供举办展销文物的场所。

2. 盛昱旧藏品

盛昱，字伯义，又作伯希、伯兮、伯熙，号韵蔚、意园，清宗室，肃亲王豪格七世孙，隶满洲镶白旗。曾任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等。盛昱金石学造诣颇深，是清代著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与吴大澂关系交好，著有《郁华阁遗集》《意园文略》等^[11]。

高岛的收藏中有7件来自盛昱的旧藏，购入年份是1937年的春末夏初（见表3）。购入价格从135金至4500金不等，其中《宋拓群玉堂米帖》、宋郑所南《墨竹》两件为高价购入，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宋代的书画价格远高于明清书画。“庚子事变”的1900年1月，盛昱因病去世，其嗣子善宝（1893—？）继承了他的书画收藏。1912年之后，盛昱的旧藏书画开始散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完颜景贤（1875—1931）^[12]在1912年5月20日，以12000大洋的低廉价格从善宝那里骗购了宋版《礼记》四十册，苏轼《寒食帖》《元人字册》，以及刁光胤《牡丹图》《礼堂图》。据下田章平氏考证，《元人字册》后来被转卖给了高岛菊次郎，高岛将其命名为《宋元名家墨迹册》^[13]。

3. 罗原觉旧藏品

罗原觉，原名泽棠，字韬元、恽卢、弢盒，号菜园病叟、道在瓦斋，广东南海人，著名文物鉴藏家，曾被誉为“岭南碑帖第一人”。罗原觉师从韩文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来专门从事研究鉴别碑帖、书画、古铜器等文物，曾任广州市立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委员。1929年至1930年，他携带书籍2箱、碑帖印本5件、画10幅、写本4件游历日本，走访了犬养毅、原田淑人、山本竟山等一大批日本汉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14]。

高岛的收藏中有4件来自罗原觉的旧藏，分别是《国学本兰亭初拓精品》（编号4，罗原觉携来）、《宋拓智永千字文》（编号23，有数子跋文，罗原觉携来，此本竟山老逸强使余收之也。盖由欲留此本邦之意极炽焉）、《朱子勤先生》（编号485，卷，罗原觉寄赠）、《诗文

表2 金颂清旧藏品统计

编号	作品名	购入时间	价格	备注
114	夏昞墨竹大卷	1936年秋		金携来
131	徐青藤草书卷	1936年		获之于晚翠轩金展观
132	莫云卿草书山居杂赋卷	1936年		金携来也
373	姚姬传秋夜七绝草书	1936年春	200金	金携来
399	钱叔盖秋山著书图	1936年夏		金氏携来，联落、半短
362	郑板桥墨竹画册	1936年初冬		金携来，题诗文、乾隆辛巳作
519	吴昌硕墨葡萄	1936年夏		金氏携来
54	天发神讖卷	1937年春		金携来，未示他直入余居也
57	唐濮阳令于孝显碑	1937年	100金	金携来
189	明钱穀淡彩山水	1937年7月中旬	1700日元	此卷金颂清余之东北旅行中携行与他数十品也。余仅此选一件，夫以北清炮火交遑去焉
341	伊墨卿词书	1937年春		金携来
445	包世臣临曹娥册	1937年		金携来，道光庚子
559	赵搗叔大字楷书四屏	1937年春		金携来

表3 盛昱旧藏品统计

编号	作品名	购入时间	价格	备注
7	清翁覃溪双钩兰亭册	1937年6月	800金	盛氏展观，有跋覃溪法式善外
56	宋拓群玉堂米帖	1937年6月	3500金	盛氏展观获之，值称五千金，折冲得宜以叁千五百金。翁覃溪他跋
12	宋郑所南墨竹真迹	1937年5月	4500金	盛氏展观，值併苏子美等诗翰鲜于伯玘书四千五百金也。神品，跋陆居仁、张长卿、高士奇、钱良友外
147	草书大字	1937年6月	450金	盛氏展观，绢本，无跋
374	张照论律法疏草册	1937年6月	360金	获于盛氏展观，何子贞崇禹舡跋
382	王文治临二王书册	1937年初夏	135金	盛氏旧藏
476	清朝名家尺牘四册	1937年夏		求于盛氏展观

稿集细书》（编号486，卷，前附先生肖像，罗君次回来朝将来）。高岛批注中的“竟山老逸”是日本书法家山本竟山，在竟山的极力推荐之下，高岛入藏了《宋拓智永千字文》。有趣的是，罗原觉带往日本的书籍，大部分都赠予了日本友人，高岛获赠的《朱子勤先生》实际上是《朱九江先生集》，除了高岛之外，汉学家古城贞吉（1866—1949）和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均获得了罗氏的书籍寄赠。

4. 罗振玉旧藏品

罗振玉，字叔言、叔蕴，号雪堂、贞松老人。罗氏不仅在甲骨学、文字学、敦煌学等学术领域有突出的贡献，而且在金石书画等艺术领域亦卓有建树，特别是在古器物鉴赏（包括

[11] 李文君：《吴大澂致盛昱信札考释》，《常州工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50页。

[12] 完颜景贤（1875—1931），字享父、任斋，号朴孙、小如庵，室名真晋堂、三虞堂，满族人。完颜是著名的书画收藏家，精于鉴赏书画，书画收藏甚富，与端方、内藤湖南交谊颇深，撰有《三虞堂书画目》。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动乱之后，完颜的旧藏书画逐渐散佚，现今其藏品的主要流向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外，还有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以及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三井纪念美术馆等地。

[13] 下田章平：《民国期における完顏景賢の书画碑帖の收藏について》，《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2010年第11期，第44—83页。

[14] 程存洁：《罗原觉日本之行考略》，载《广州文博》，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2017，第292页。

书画)方面,早在王国维在江苏师范学堂任教(1904)之际,罗振玉就已被王乃誉尊为“巨眼”的大师级人物。1911年,罗氏流寓日本之后,以满清遗老和王朝正统自恃,所携带的书画藏品成为他与日本学界交往的“文化资本”。

高岛的收藏中有许多作品有罗振玉的题跋或者是鉴藏印,目前可以确认有5件为罗氏的旧藏品,分别是《旧拓魏杨大眼造像碑有额》(编号53,罗振玉旧藏,昭和11年冬藏之,值百金也)、《听泉图卷》(编号109,设色山水图卷,昭和12年春求之,罗振玉旧藏)、汤貽汾《竹外数峯》(编号385,罗振玉旧藏)、清王蓬心《浯溪图卷》《清边寿民小品》。最后两件为罗振玉旧藏书画清单中的作品,1911年罗氏将其寄往日本,曾在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现京都市立艺术大学)公开展出,后来被高岛购入典藏^[15]。

5. 古董商“井上晚翠轩”

晚翠轩除了经营古美术买卖,还作为美术出版商发行了珂罗版《宋拓澄清堂帖》(1920)、《庙堂碑唐本》(1922)、《北宋拓雁塔圣教序》(1933)等作品。另外,晚翠轩还将业务拓展到了中国料理,从北京聘请厨师推出风行一时的正宗中国菜,是当时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1932年,井上清秀之子井上恒一(1906—1965)在晚翠轩举办了“朝鲜工艺品展览会”,此后晚翠轩的古董业务发展迅速。井上恒一是晚翠轩的第二代掌门人,以收藏中国陶瓷器著称,他时常前往中国出差并在北京琉璃厂等古董街收购文物带回日本销售。

高岛直接通过晚翠轩购入的书画至少有3件,时间最早的是购自1912年的杨守敬《东坡句》(编号382,七绝、联落,大正初求之于晚翠轩),其余两件分别是购自1936年的《汉华山庙碑》(编号36,长垣本静圃双钩,付跋文书写,昭和11年求于晚翠轩,值120元)和购自1937年的董其昌《明礼部主事吴敦之使君传》(编号145,行书卷,昭和12年5月购于晚翠轩,值550金)。综合金颂清在晚翠轩举办展览和“盛氏展览”的购藏情况

[15] 苏浩、邱吉:《1911年罗振玉旧藏书画售入日本始末及其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3期,第1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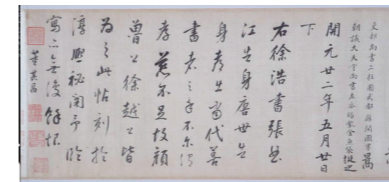


图4. [明]董其昌,《临唐徐浩书张九龄告身》(局部), 248cm×25cm,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5. [明]唐伯虎,《梦筠图》(局部), 103cm×29.5cm,重要艺术品,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来看,高岛大规模从晚翠轩购入藏品的时间应该是1936至1937年之间。

6. 古董商“守口有香堂”

高岛从守口三郎的“有香堂”购入的书画共有9件,其中5件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分别是“编号434,倪元璐,统本,联落,昭和10年3月,守口纳入,值200金”、李复堂《竹石图》(编号320,春竹墨色秀润。富山县人某所藏,昭和12年孟夏有香堂为余获之归)、“编号464,江禹绪,崇祯进士,昭和14年晚春入手经守口有香堂”、王铎《长条幅》(编号425,昭和16年6月,守口有香堂,傅山临书共金500金)、傅山《临书》(编号444,昭和16年6月,有香堂,与王铎长条幅值金500金)。以上5件购自1935至1941年之间,剩余4件为高岛从守口三郎处购入的完颜景贤旧藏品,购入具体时间不明,分别是元杨维桢《草玄阁落成诗册》、明董其昌《临唐徐浩书张九龄告身》(图4)、明陈淳《花卉图卷》、清边寿民《芦雁图》^[16]。

7. 山本悌二郎旧藏品

山本悌二郎,号二峯、香雪书屋,斋号澄怀堂,近代日本实业家、收藏家,新潟县人。曾担任台湾制糖株式会社社长、内阁农林大臣、大东文化协会副会长。山本的汉学素养极高,年少时跟随儒学家圆山溟北(1818—1892)学习,善作书法和汉诗。山本还热衷于收藏中国书画,多次亲赴中国广东、苏州、上海等地探访名家,其书画收藏鼎盛时期多达2000余件,著有《澄怀堂书画目录》《宋元明清书画明贤详传》《游燕诗草》等。

从表4可知,高岛的收藏中有26件作品来自山本悌二郎的旧藏,购入价格不明。关于藏品的购入时间,仅有唐伯虎《梦筠图》(图5)、孙克弘《寒山拾得图轴》、沈石田《万寿吴江图》3件记载为1935年和1936年。1932年,山本从内阁农林大臣上步下政坛后,晚年陷入财政危机,陆续出售了一部分藏品,例如1933年美国玛利亚基金会收购了山本旧藏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入波士顿美术馆典藏。因此,可以推测高岛购入这批藏品的时间很有可能在1932至1936年之间。

[16] 下田章平:《完颜景贤の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载关西中国书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编《关西中国书画コレクションの过去と未来》,黒川古文化研究所,2012,第44—45页。

表4 山本悌二郎旧藏品统计

编号	作品名	备注
4	元康里子山书翰	朱九丹、山本二峯旧藏，罗振玉题签、题跋
9	宋大儒张南轩墨迹卷	行书，二峯旧藏
101	沈石田万寿吴江图	并诗书卷，二峯旧藏。经江藤长安堂，昭和十一年入余堂
116	唐伯虎梦筠图	二峯山本氏旧藏，昭和十年获之
125	王宠小楷	自作杂诗十四首卷，二峯旧藏
152	陈眉公彩笔江南秋景卷	董玄斋题诗，二峯旧藏
156	假庵行书柴公墓志册	二峯旧藏
169	杨文聪金笺水墨山水长卷	二峯旧藏
192	王思仁诗翰真迹	二峯旧藏
309	龚鼎孳纪映钟书龚魏唱和诗卷	二峯旧藏
310	毛奇龄大幅	山本二峯旧藏
318	恽南田恽东园山居图卷	二峯旧藏
342	戴明说统本条幅	二峯旧藏
352	邓完白七言行书	山本二峯旧藏
367	袁随园诗翰册	二峯旧藏
378	吴熙载花卉四屏	纸本，吴云题，二峯旧藏
390	段玉裁尺牍册	二峯旧藏
391	翁方纲画锦堂记行书册	二峯旧藏
403	董其昌大长条幅	大书七绝，山本二峯氏旧藏
406	曾国藩行书官籤	长大幅，二峯老旧藏
411	法梧门楷书二则卷	中有草书一纸，翁覃溪并诸家题识，咏诗龕二百，二峯旧藏
435	倪元璐草书七言	题画七绝，欽堂题，二峯旧藏
436	倪元璐题画七绝	统本，山本二峯旧藏
437	倪元璐五律	绢本，满市花风起，黑木额，二峯旧藏
447	黄道周长条幅	统本，长七尺八寸，巾一尺七寸五分，石城寺七律。山本二峯旧藏
450	孙克弘寒山拾得图轴	山本二峯旧藏，十年入吾手

8. 山本竟山旧藏品

山本竟山，名由定、繇定，号竟山、聋风，岐阜县人，近代日本著名书法家、收藏家。竟山先后师从神谷简斋、日下部鸣鹤、杨守敬学习书法，曾七次（1902—1930）前往中国游学，收集金石碑帖书画，与王一亭、罗振玉、吴昌硕等文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曾担任泰

东书道院、日本美术协会、东方书道会顾问，著有《竟山学古》《临兰亭二种》等^[17]。

高岛的收藏中有12件作品来自山本竟山的旧藏，购入价格不明（见表5）。1936年4月，竟山去世两年后，京都美术俱乐部举办了“故山本竟山先生遗爱品”拍卖会。经笔者查证关西大学博物馆藏《故山本竟山先生遗爱品及某家入札目录》，并结合高岛备注中“昭和九年春”“竟山老遗墨品”“京都遗品竞卖”等信息可知，高岛的这一部分藏品购自京都的拍卖会。

9. 河井荃庐旧藏品

河井荃庐，名仙郎，字长生，号荃庐、荃楼，京都人，近代日本著名篆刻家、收藏家。河井早年师从篠田芥津学习浙派篆刻，后来因仰慕吴昌硕前往中国成为其门生，1906年成为西泠印社早期成员。河井多次访问中国，除了吴昌硕之外还与罗振玉、汪康年、吴石潜等文人结交，致力于向日本介绍中国的文人趣味^[18]。

高岛的收藏中有6件来自河井荃庐的旧藏亦或者是经河井的介绍购藏（见表6）。购入价格方面，仅《旧拓颜真卿争座位帖》一件有“值三百金”批注，其余价格不

[17] 邱吉：《王一亭の日本交友からみた日中关系と今后への模索—水野梅晓、长尾雨山、山本竟山を中心に—》，载宫本雄二监修《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文化の流行》，日本侨报社，2019，第71—82页。

[18] 松村茂树：《河井荃庐の印学》，载西泠印社编《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第823—830页。

表5 山本竟山旧藏品统计

编号	作品名	备注
46	龙藏寺碑	竟山老旧藏
126	醉翁亭记	小楷册，竟山旧藏
139	明贤诗翰合作卷	竟山旧藏
182	明李竹嫩题鹤洲书屋诗卷	行书，梧竹杨守敬鸣鹤一六觀又跋，竟山旧藏
381	顾鹤逸春景山水	小点绢本横披，光绪二十九年，竟山老游长江时写赠之
383	杨守敬渊明饮酒诗	竟山老遗爱
391	翁同龢联大字	吴昌硕题，竟山遗爱
394	何绍基隶书四屏	竟山遗爱
420	王铎草书	竟山老遗墨品，王文安四十八岁作。昭和九年春于京都遗品竞卖入作同秋原改装
421	王铎临右条幅	竟山老遗爱，天启十六年五十三岁作
453	何道州临汉碑二种大册二	八十二岁作，竟山老遗爱，妙品
517	吴昌硕集石鼓联	竟山遗爱

明，该件的购入时间为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另外，吴历《山水图》和邓完白《分书册》分别购自1933年和1936年。除了河井之外，高岛批注中的“钟山氏”即小野钟山亦是其藏品介绍人。小野钟山，名鹰男，号钟山、研生，日本大分县人。小野是近代日本著名的书法家和 中国古砚研究专家，曾任日本书道作振会审查员和帝国习字速成学会会长。高岛经小野介绍购入的藏品有3件，分别是吴让之《联》（编号377，11年春求介小野氏，值140金）、徐天池《椿花立幅》（编号406，昭和12年经钟山氏获之）、吴廷颺《联》（编号461，11年冬求经钟山氏，值140金）。

三、复古与传承：对抗“煎茶道”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槐安居藏品”中现存中国书法和碑帖共221件，其中以西周至北宋的石碑为主的金石铭文拓本17件，法帖15件，北宋至民国的文人法书179件。代表作品有王羲之《定武兰亭序孤独本》、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米芾《行书虹县诗卷》、董其昌《行书项墨林墓志铭卷》等名迹，可以说是一批能够概观从古代至近代中国书法史的贵重资料，极具史料价值^[19]。除此之外，“槐安居”收藏的中国绘画有124件，其中少数为宋元绘画，主要以“吴派”、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四王吴恽、扬州画派、海上画派等明清文人画为主。高岛的11册书画收藏笔记中，有7册是他对明清绘画的详细批

[19] 六人部克典：《高岛槐安コレクションの中国书迹》，载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编《清朝书画コレクションの诸相》，台东区艺术文化财团，2021，第82页。

表6 河井荃庐旧藏品统计

编号	作品名	备注
350	吴历山水图	此幅将来际中国某富家之子游学吾邦也，父亲戒彼曰万不得止时以此代资，介河井老遂入余居焉，于时昭和八年比
393	邓完白分书册	昭和十一年获之，经仙卢氏
413	旧拓颜真卿争座位帖	大震后求之，经仙卢翁，值三百金
424	王铎行书条幅	统本，颇得六朝之气，河井氏将来
522	虚谷扇面	金鱼，辛卯岁，鸣鹤访上海际寄赠者，翁歿后归仙卢氏。有遂入吾居矣
550	赵搗叔四幅	劳钟山氏倩仙卢氏获之，快哉

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岛的这种以明清绘画为特色的收藏，反映了20世纪初期日本对中国绘画评价变化的一个侧面。

高岛曾在回忆中说过：“我这次寄赠给博物馆的主要是到清末为止的书画，是一些粗糙的东西，当然，虽不像世间的收藏家一般都是名品，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些有年代的东西，能给美术研究者提供一些历史参考。”^[20]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之后，以清宫内府、贵族官员、富商等为代表的皇家收藏和民间私藏绘画大规模地流往日本。这批绘画与室町时代以前传到日本的“古渡”绘画（以足利将军家的“东山御物”为代表）以及与江户时代传到日本的“中渡”绘画（以来舶清人画家的作品为代表）有所不同，它们被称为“新渡”绘画或者“新舶载”，以在此之前几乎尚未传入日本的中国绘画史上的主流文人画为主。高岛致力于明清书画收藏的20世纪30年代前后，正是“新渡”绘画流入日本后，日本文艺界对中国文人画历史理解逐渐加深，与“古渡”绘画相抗衡的评价确立的时期^[21]。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高岛能够收集规模如此庞大的中国书画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及的高岛自幼开始有着深厚的汉学素养、长期的滞留中国经历、雄厚的经济资本以及热衷于“中国趣味”的文人交友圈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日本“煎茶道”的一种抵制。高岛曾在与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杉村勇造（1900—1978）的通信中透露：“那时候，我之所以开始收集中国的书画，是因为大多数实业家们沉迷于品茶趣味和观赏名器，我也意在与他们对抗。”^[22]如果回顾近代日本接受中国文物的状况，我们就可以发现从江户末期至明治时期，诗书画一体的“唐物”雅趣和文人趣味风靡一时，日本上流社会在煎茶会上沉迷于欣赏煎茶器具与文房用具。到了明治末期至大正、昭和初期，由于受到明治政府推行的美术行政制度、汉学改组以及20世纪初期中国主流艺术品流入日本等因素的影响，盛极一时的“煎茶道”在大正前后走向衰落^[23]。

[20] 高嶋菊次郎述、河野幸之助编纂《思い出すまゝ：高嶋菊次郎回顧録》，高嶋菊次郎回顧録刊行協賛者同人，1967，第158页。

[21] 久世夏奈子：《『國華』にみる新来の中国绘画：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美術観の一事例として》，《國華》2012年第117卷6号，第5—17页。

[22] 杉村勇造：《槐安翁：中国の老大人》，载《槐安居春秋》，槐安居春秋刊行会，1970，第202页。

[23] 富田升：《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徐二红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第6—11页。

20世纪初期“煎茶道”虽逐渐式微，但是日本传统审美品位中以“器物”为本位的审美价值观念根深蒂固，当时的实业界中大部分藏家对品茶趣味仍然保有相当的热情。据原田悟朗（1892—1980）回忆，清末民初流入日本的中国绘画，与从前传来日本“古渡”绘画的性质不同，几乎没见过而被认为是“赝品”，这种想法曾在东京的藏家中流行。茶人们并不把这些作品当作绘画看待，而仅仅关注其是否迎合了茶道的嗜好与情趣。例如，苏东坡《黄州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李氏《潇湘卧游图卷》（该作品被高岛购入，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清内府的秘藏名作在当初都被视为“赝品”，无人问津^[24]。在此种背景之下，高岛的绘画收藏活动可以说与当时的品茶趣味背道而驰，他甚至在收藏家的圈子当中被嘲笑为只买“便宜货”^[25]。在文物价格方面，一般的中国绘画确实比不上价格高昂的“茶道具”，然而高岛却能从中慧眼识佳作，他对中国书画的热爱与坚守着实难能可贵。杉村勇造曾说：

高岛翁不像众人般仅是享受鉴赏的过程，他一旦购入书画就会很耐心地进行调查，为了制作目录，亲自将作品逐幅临摹，决不含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地向我提出尖锐的问题。此外，他将作品轻拿轻放，几乎都是自己亲手操作完成。^[26]

可见，高岛对中国书画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因此才会对购藏的书画展开近乎严苛的整理与研究。高岛将中国书画购入典藏后也并非秘不示人，他通过珂罗版印刷和展览这两种具有“近代性”的新式传播媒介，将藏品予以展示和影印出版。据珂罗版图录《唐宋元明名画大观》记载，1928年，高岛在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上曾展出过明徐渭《水墨花卉卷》（图6）。

此外，笔者对高岛选刊在《中国名家墨迹》和《书苑》杂志上的作品进行了统计^[27]，1934至1944年共刊载和介绍了诸如张瑞图《草书五言律诗立轴》、傅山《行



图6. [明]徐渭，《水墨花卉卷》（局部），790cm×28.5cm，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24] 鹤田武良：《原田悟朗氏藏书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中国画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载《中国明清名画展：中国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秘藏》，日中友好会馆，1992。

[25] 松村茂树：《高岛槐安论：その收藏と素养》，《大妻国文》1992年第23卷，第87页。

[26] 杉村勇造：《高岛菊次郎翁のこと》，《国立博物馆ニュース》1969年4月号，第10页。

[27] 统计数据来自河井荃庐，井上吉阳编《中国名家墨迹》（晚翠轩出版）第1至3册，《书苑》（三省堂出版）第2卷第7号（1937年7月）至第8卷第2号（1944年2月），由于出现了相同作品在《书苑》不同卷次上重复刊载的情况，本数据只选取首次刊载的卷次进行统计。

草书五言律诗轴》、倪元璐《诗画册》、华岳《杂画册》、郑板桥《墨竹册》等明清书画名作40多件，实际上这些书画与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大型茶会上（茗宴）用作装点茶席和壁龛的明清书画（江户时代传到日本的“中渡”书画）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与日本传统的“唐物”相比画风“迥异”，但是这批书画是以清宫旧藏和民间私藏名品为主的中国主流作品。高岛对明清书画的价值认同，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诸多因素之外，可能还源于20世纪初期中日美术交流背景下日本文艺界主张回归“东洋美术”传统的影响。在日本明治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西化浪潮中，全盘西化的政策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28]，内藤湖南（1866—1934）、竹内栖凤（1864—1942）等国粹运动支持者和传统日本画家开始主张回归“东方文化”。忠实于传统笔墨风格的日本“南画”家小室翠云（1874—1945）：试图在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中主张恢复东方的古代精神。据《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趣旨书》记载，1928年唐宋元明名画展览目的之一就是向世界弘扬东方美术之精华^[29]，高岛赞成该会的趣旨并同意作为出展人将藏品展出，这与日本文艺界复兴东方传统文化的方向是一致的。

余论

20世纪初期，由于世界政治局势的动荡，东亚美术界也随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以中国和日本为例，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剧变致使原本属于皇家贵胄、巨贾文宗收藏的中国书画大批流往海外，聚散沉浮的范围由中国扩及日本乃至全球。藏品流入日本后，先是被日本的汉学家、实业家、收藏家、书画家鉴藏，随后又出现在了展览会和珂罗版图录上。另一方面，日本明治后期至20世纪初期，由于艺术市场的显著发展、西方现代主义抽象艺术的冲击，以及西方文明暴露的种种弊病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促使日本文艺界产生了重新审视“东洋美术”的复古思潮，进而出现了重新关注和收藏中国

[28]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第442—443页。

[29] 《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趣旨书》，载《展览会关系杂件》第四卷，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编号：H0786），第38—39页。

书画的热潮^[30]。

高岛菊次郎的中国书画收藏、整理与研究活动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完成的，根据高岛菊次郎收藏笔记的编号记载，他的书画收藏数量在顶峰时总数有500余件。日本著名书法家西川宁（1902—1989）在高岛将藏品寄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之后，立刻写信给高岛激动地说道（图7）：“博物馆的明清书画收藏极其稀少，此后势必会名声大噪……不得不说此次的捐赠壮举具有国家性的意义。”^[31]值得一提的是，高岛的“槐安居”收藏还引起了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1899—1983）的关注，1959年张大千访日之际曾与高岛有过会面和交流（图8）。高岛的中国书画收藏作为近代日本中国书画收藏中的一个典型个案，为日本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材料。

回顾高岛菊次郎整个的收藏活动，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特点。首先，阿部房次郎、上野理一等日本关西收藏家的收藏活动基本是在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罗振玉等学术顾问的指导下进行的^[32]，而高岛作为日本关东的收藏家代表，与关西收藏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书画收藏活动几乎都是由自己甄别完成。“槐安居”的高质量收藏不仅反映了高岛深厚的书画和汉学素养，还凸显了他对中国书画独特的审美和鉴赏品味，高岛对这批书画的价值认同，诠释了近代日本的中国书画鉴赏品味从“煎茶趣味”转向“新舶载”的收藏案例。其次，高岛的中国书画收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的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进一步推进了美术史学科的发展，这种跨文化的艺术交流和学术研究的相互促进，体现了艺术和学术在不同文化间桥接的独特价值，可以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在域外赓续传承的基因密码。再次，高岛菊次郎收藏的中国书画，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日本博物馆的馆藏，还拓宽了日本人对中国书画笔墨精神和文人意涵的理解，提升了日本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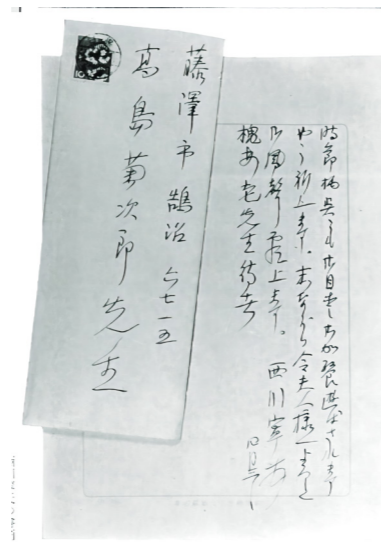


图7. 西川宁致高岛菊次郎书札（部分）图版采自槐安居春秋刊行会编：《槐安居春秋》，求龙堂1970年版



图8. 从左至右：杉村勇造、张大千、高岛菊次郎，图版采自槐安居春秋刊行会编：《槐安居春秋》，求龙堂1970年版

[30] 邱吉、苏浩：《民国初期廉泉与日本艺坛的互动》，《美术学报》2020年第6期，第70—77页。

[31] 西川宁：《西川宁氏的书简》，载槐安居春秋刊行会编《槐安居春秋》，求龙堂，1970，第207页。

[32] 邱吉：《东瀛遗珍——阿部房次郎藏中国书画研究再考》，《美术观察》2023年第5期，第80—86页。

文象推合：宋代书籍的图文关系与视觉传播

The Research on Image-texts Relationships in Sung Books

岳鸿雁 YUE Hongyan

摘要 当代媒介文化已经出现“图像转向”，并迎来了“后印刷时代”，因此媒介的图文关系至关重要。宋代是中国书籍发展史上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本研究运用文本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和图像分析法从视觉逻辑、功能逻辑、价值逻辑回溯宋代书籍图文关系。两宋书籍图文关系所表征的认知方式和视觉体验，反映了中国古人从眼观（视觉逻辑）到理观（功能逻辑）到心观（价值逻辑）的认知过程，是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和中国书籍图像观念的重要部分。

关键词 图文关系，视觉传播，书籍设计，宋代书籍

Abstract: The Sung Dynasty was the golden age of woodblock print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development. The image-text relation of the Sung Books started the illustration narrative tradition of the supremacy of pragmatis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age-text relation of Sung books from three aspects: form, function and value. The cognitive mode and visual experience of Sung Books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Chinese books design.

Keywords: image-text relation, visual communication, book design, Sung Book

今天，无论是平面媒体设计中，还是以手机阅读为代表的电子媒体设计中，图文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海派连环画的历史形成与当代价值”（2021BWY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岳鸿雁，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市创意文化中心副研究员，设计学博士，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连环画基地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设计传播、视觉传播、城市品牌、文化创意。